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王德京

学术指导

李 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研
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

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编者说明

一、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6卷。本卷汇集了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的部分中文文献资料，包括过去已经由外文译成中文的其他有关文献资料^①。

二、本卷分为四个专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国大革命问题，也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主流派与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争论的一次大爆发。为使内容集中起见，将此次会议的有关文献编为一个专题。此次会议前后的有关文献资料分别编为两个专题。1929年以后的有关回忆和学术讨论资料则作为附录。

三、本卷各个专题及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大体上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原稿中的音译人名按约定俗成的原则作了统一处理，明显的文字错误已作订正；原稿中有着重号的地方，一律改为黑体字。

四、本卷注释除标明为原编者或译者所加外，其余均为本卷编者所加。

^① 译者稿酬由出版社根据有关规定支付。

五、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王德京同志负责选编，姚金果博士参与了有关资料的核校工作。

目 录

编者说明·····	(1)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上）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 季诺维也夫	(1)
(1927年4月14日)	
中国革命问题····· 布哈林	(34)
(1927年4月19日)	
中国革命问题····· 斯大林	(77)
(1927年4月21日)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 托洛茨基	(84)
(1927年5月7日)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	
(1927年5月18日—30日)	
布哈林的报告·····	(112)
讨论·····	(132)
报告人布哈林的结束语·····	(200)
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210)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斯大林	(217)
(1927年5月24日)	
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发言·····	(23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总结（节录）	

.....	布哈林 (239)
(1927 年 5 月)	
三、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下)	
时事问题简评 (节录)	斯大林 (257)
(1927 年 7 月 28 日)	
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	布哈林 (279)
(1927 年 8 月 18 日)	
对反对派的批评意见	斯大林 (290)
(1927 年 9 月 27 日)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 (节录)	(293)
(1928 年 6 月)	
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	托洛茨基 (306)
(1928 年 6 月 8 日)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349)
(1929 年 12 月 10 日)	
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等 (366)
(1929 年 12 月 15 日)	
四、附 录	
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	李立三 (384)
(1929 年 9 月)	
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论	罗 易 (395)
(1929 年)	
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 1930 年学术讨论会记录	
.....	(402)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 1925—1927 年革命中的	
错误问题	维经斯基 (474)
(1930 年)	

论陈独秀主义	蔡和森 (500)
(1931 年 9 月 10 日)	
托洛茨基给伊罗生的四封信	(525)
(1936、1937 年)	
彭述之为《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导言	(544)
(1976 年)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 中国问题的争论（上）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

季诺维也夫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考虑到中国问题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所以我以书面形式来表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由于在讨论中国问题的莫斯科干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进行论战并把实际上我没有的观点强加于我，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我请求把我的这个提纲向全会的与会者散发。因为我将请求全会把这个提纲作为中央即将作出的关于在上海被占领和最近所发生的其他事件以后中国形势的决议的基础。

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5日于莫斯科

* 这个提纲从未正式公诸于世，也没有被译成中文发表过，这里是根据西柏林新方针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中国——被扼杀的革命》一书译出的。本刊摘要发表，仅供参考。——原编者

中国当前所发生的事变，和 1923 年 10 月德国所发生的事变一样，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如果说我们当时把我们党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德国身上的话，那么今天关于中国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何况国际形势对我们来说更复杂和更危险。

中央当时在 1923 年利用德国发生事变的机会，召集了地方党组织（和全会一起）的非常代表会议，通过了专门的提纲，动员了全党，并通过自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召集了国际非常代表大会，等等。

今天同样应该这样做。

.....

5. 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今天在革命中的作用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农民的问题。

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吗？

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清一色的：它的主要类型是旧的商业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大规模地限制这个资产阶级的发展，所以它把在商业中所积累起来的资本都集中投到土地上（而这就是中国农民遭受剥削的封建根子）。

在有些地区，整个耕地面积的 75% 归商人所有。高利贷者放出的债一年要向农民收回高达 120~360%。商业资本完全控制了家庭劳动和手工劳动，首先是控制了在中国起重大作用的纺织工业。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中国的大地主到城市做商人，他们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相结合在一起。这期间中国农村开始内战。农民组织起农会，参加农会的已经有 500 万人，建立起武装的农民自卫队，而且已经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总是组织得很好的大地主和乡绅，包括他们的武装队伍——民团。

所以农村中的内战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毋庸置疑，这一战争

的战线已经很快地扩大，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相当多的阶层（至于道道地地的大地主则不用说了）在这场战争中今天已经站在革命街垒的对立面，聚集在国民党右派的周围。

在城市每天都在进行无产阶级反对当地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有大规模的罢工。在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的头两个半月，那里已有 20 万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仅仅争取到以 13 小时工作制取代 17 小时工作制，以 10 个半小时工作制取代 11 个小时工作制。在广州，罢工斗争几乎发展到爆发总罢工。

在参加工会的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中国的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同大地主相勾结，并且向外国帝国主义妥协，以便同它结成同盟来镇压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

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也无法领导农民，因为它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同大地主有勾结，它通过政治上的联盟同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因此这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农民和日益发展的革命，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成为反革命的因素。

农村的内战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一开始爆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就发生危机。国民革命政府只能是这一内战的参加者，也就是说，要么成为工农和城市贫民的政府（因而是反帝政府），要么成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因而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的政府。

6. 国民党是什么？

国民党是什么？对此必须十分清楚，否则就会犯大错误。

从 1922 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起就开始组织这个党，其表现就是 1924 年 1 月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向左发展，其表现是试图依靠工农和城市贫民，这当时便引起了广州资产阶级起来（商团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这一路线。在工农的帮助

下 1924 年镇压了广州的资产阶级，这导致工农分子纷纷涌入党内。一时间，工农和城市贫民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多数。1926 年 12 月广州的组织计有 15 万名成员，其中大学生 30000，工人 32000，农民 64000。如果除去大约占农民总数 25% 的混在农民旗帜下的乡绅和大地主，激进的左派分子仍然占绝对多数。但是这个左派多数不领导党。领导党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少数，他们依靠国民革命军指挥部，在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下，国民党右派在这个军队所占领的每一个地区内直到今天还掌握着政权。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走得如此之远，他们在这个军队的指挥部的帮助下，不仅掌握着国家机器，而且还驱散国民党的委员会，如果它们不代表纯粹资产阶级的路线的话。（李济深在广州的政变。）按照这种方案，国民党成为一个在右派领导下的不定形的组织。几乎根本不由组织召开会议，对政治行动和国家建设的问题也不进行讨论。

因为不召开会议，所以党员根本没有可能影响当局的政策。这些情况导致国民党的群众在客观上反对掌握着党的领导和局部政府权力的右翼。中国共产党人竭力依靠党的这个大多数，他们必须同大多数左派一起打倒右派，把他们既从党内也从政府中清洗出去。这样的清洗过程同武装工人和农民联系在一起，因为依靠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机关的国民党右派无疑将用武装来抵制左派要掌握政府权力和党的领导的企图。至今工人岗哨不是没有武装就是被当局解除武装（广州）。农民协会主要以竹竿来武装，他们的武装需要时间。因此，在革命被武装得更好以前，上面的策略是必要的。今天，当依靠唐生智来反对蒋介石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这些策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唐生智也不会解决使政府向左发展的问题，因为这位将军比蒋介石更反动。他是大地主，与日本帝国主义保持着联系，但是 1926 年却讨好国民党。

国民党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学说。列宁评价孙文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的民粹主义。而实际上孙文主义“就其纯粹

形式来说”，是特殊的、变了样的、适应中国条件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列宁称孙中山的党为自由主义政党。孙文主义是中国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加立宪民主主义。与孟什维克相反，列宁在俄国民粹派身上不仅看到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而且看到他们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核心，也就是就民粹主义是俄国逐渐成熟的土地革命的表现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动内容，而且也要看到它的进步的和民主主义的特点，孙文主义首先表示追求中国的民族统一，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追求农民革命。这一国民运动日益变成农民运动。但是，在孙文主义中知识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今天的国民党中他们形成强大的和有影响的一翼，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孙中山于1894年建立“兴中会”，这个党几乎只依靠资产阶级。1905年孙中山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同盟会”，这个党已经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农民。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前不久，孙中山为今天的国民革命党，即国民党奠定了基础。他把自由资产阶级、知识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家庭手工业者的广大阶层吸收进来，同时试图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

虽然孙中山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被剥削群众的真诚朋友，但是他在自己的学说中仍然只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孙中山长期来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热烈崇拜者，早先的美国总统林肯是他的理想，他声称，在夏威夷岛上由美国帝国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天堂。

农民问题在孙中山的学说中也非常缺乏研究。

孙中山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和在日益成长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下开始越来越注意工人运动，并且确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孙文主义的三个主要口号众所周知，就是：“1. 民族主义，2.

民主主义,3. 国家社会主义。”^①集中起来,它们形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很清楚,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不可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基础。人们可以和应当把孙中山当作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来纪念,他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伟大贡献。人们可以和应当把孙中山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定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盟者,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孙文主义,而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孙文主义?问题就是这样。

作为政治组织的国民党是什么?国民政府是什么?国民军是什么?

人们常说,今天的国民军就是红军。但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既不应当把它同我们革命的红色程度相比,也不能同红军相比,因为它既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部队,像我们的红色近卫军部队那样,也不是一支由工人领导的和从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军,像我们的红军的情况那样。国民军是非常不纯的。它的广州的核心被加入它的组织得很坏的部队所扩充。在今天组成的40支部队中有35支是在战斗中转向南方这一面的。这些军队是由雇佣兵组成,志愿兵占很小比例。但是,普遍的形势使他们成为一支很好的革命的和作好战斗准备的农民军。元帅权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它恰恰是不可靠的。国民军的指挥员大都不仅不熟悉工人,而且也不熟悉农民运动,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久前还站在北方那一面。共产党人在军队中为数很少。总司令蒋介石是右派,即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已经一再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是会背叛中国革

^① 即民生主义。——译者注

命的人。他的最近的声明(1927年3月)被赞美成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胜利,其实是一个外交步骤。这就像克伦斯基在一段时间内利用声明来对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一样(当时这个中央委员会还企图保持中派的立场),所不同的是,蒋介石现在占有的实权比克伦斯基当时占有的要多。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进行的第一次政变并不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追求功名的斗争”(如政治庸人所说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蒋介石的胜利导致广东反动派的胜利,反革命武装部队(所谓民团)加紧摧毁农民协会和解除农民武装。旧官吏又回到政府里。工人受到重大的打击。

国民政府直到最近都是将军们手中的工具。只有群众的压力才能缓和政府的右倾和使比较左的分子参加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是费边分子一类的人)。国民政府往往公开反对工农运动:在许多地方镇压工人罢工和扼杀农民运动,它阻止运动的发展和制止运动,采取瓦解和逮捕的手段并竭力把农民运动说成是土匪运动,它支持罢工破坏者组织反对工人。它拒绝农民的最合理的和最基本的要求。它既不认真地从“上面”给农民什么东西,同时也不允许这个运动从下面发展起来。直到1925年大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一直起主导作用。

广州直到不久前还是国民运动的主要据点。这里长期来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因此,了解国民政府对广州工人运动的态度是特别重要的。广州工人的实际工资自1917年以来下降了约50%。广州工人的平均工资在每月3元和10元之间。只有少数熟练的产业工人(他们组成工人贵族,占广州20万工人中的极小一部分)每月在15元和27元之间。正是这群工人贵族组成机械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不是加入阶级的工会,而是追随国民党右派。

国民政府在“国内和平”的口号下要求工人“在国民革命军前线的后方”不举行罢工,而且一切经济冲突要由政府的调解委

员会来裁决。工人乐意这样做；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调解总是有利于企业主。撇开公开站在资本家一边的场合不谈，政府的劳工局常常作出判决工人饿死的调解决定。国民党内有“劳工部”，此外还有“商人部”。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商人部施加压力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把国民党的官方机关拉到自己一边。孙中山在世时就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资产阶级借口对付所谓的“红色恐怖”，组织了他们的武装打手。最近甚至发生企业主私刑拷打工人，至于把工人从企业中扔到大街上去，就更不用说了。广州国民政府对于企业主的这些英雄行为不仅常常视而不见，而且还鼓励建立黄色工人组织，由以前转到企业主一边的工人领袖来领导。政府反对武装工人。1926年8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命令解除工人武装、逮捕工人和将那些拿起武器反对企业主的雇佣打手的人送交军事法庭。1926年12月，在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出发去武汉以后就已经公布类似的命令，并且工人被为此目的而动员起来的部队解除武装。

在政府从广州出发以后，“革命的”将军李济深就解散了“左派”影响“太大”的国民党广州委员会，并且实际上建立了右派委员会。同时在5万名国民党党员中只留下13000名党员，工人退出了。但是在这个委员会中还有共产党人。这位“革命的将军”还隆重接待来到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但是共产党人参加接待时揭露了李济深这位广州的真正主人的这一切英雄行为。

国民政府的警察局继续袒护罢工破坏者联盟反对真正的工会，在警察局的庇护下企业主一再镇压罢工。1926年10月第3军第25团的一部分武装士兵在夜晚侵入火车车辆修理厂并开始射击工人，造成伤亡。这起“事件”的发生与铁路上的一起和平的经济冲突有关联，在这一冲突中国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起了不小的作用。